

·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

留守经历、情感模式与互助型夫妻关系实践

——留守经历的叙述与意义阐释

佟 新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研究通过对三位有过留守经历的女性叙述,理解其留守经历对她们情感生活的意义。研究发现,童年和奶奶的共同生活使她们记忆的是“有奶奶的家”,和奶奶一起生活,让她们学会了独立和能吃苦的精神。成长后的她们以独立身份经营自己的情感、生育与夫妻关系,大致形塑了三类情感模式:一类是以愤怒为基础的敏感和自尊式情感类型;一类是以艰苦勤劳为底色的自信和自主式情感类型;一类是以需求被满足为基础的自爱和学习型情感类型。新生代女性是我国欠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受害者,她们抓住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摆脱父权制和母亲命运的创造者、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互助型夫妻关系的主导者。

[关键词] 留守经历;奶奶在的家;情感模式;主体性;互助型夫妻关系

[中图分类号] C91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24)01-0013-13

一、遇到已成年的留守女童

2022 年夏,我们开展了“数字就业赋权县域女性”的调研项目,这是对蚂蚁公益基金会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支持的“AI 豆计划”的人工智能产业孵化项目的考察,该项目致力于创建“人工智能+扶贫”的公益新模式,于 2019 年 8 月正式启动,在全国欠发达县域建立了 20 个“数字就业中心”,解决了上千人的就业问题,其中女性占到 70%。2022 年 5~8 月,调查组对 8 个数字就业中心进行了实地调查,访谈了 112 名女性从业者。在贵州省遵义和铜仁调研时,笔者遇到了晓伟、阿霞和晓美三位有过留守经历的女性,其中有两位已婚。她们从事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工作,穿着时尚、爱笑、经济自立、有职业理想和人生梦想。访谈中,她们坦诚地谈起自己的留守经历,她们的叙述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晓伟,1996 年出生在贵州农村,大约 5 岁左右,妈妈就跑了(到 2022 年夏天在金沙作研究时,金沙民政局的相关干部说,现在还有“妈跑”,就是找不到妈妈了,妈妈离开了,这样的孩子在制度上不在民政局登记的困境儿童保护的范围内),爸爸又另娶他人去外地打工,她跟着奶奶长大。她大专学历,未婚,访谈时刚刚和男朋友分手。

阿霞,1992 年出生在贵州山区,大约 5 岁时妈妈带着她改嫁,上小学后,妈妈就和爸爸一起外出打工,她跟奶奶长大,奶奶当时带着 6 个孩子。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已婚,有两个孩子,大的 7 岁,小的 3 岁。

晓美,1996 年出生在贵州农村,小学阶段父母外出打工,初中时妈妈回乡。她大学学历,已婚,

[作者简介] 佟新,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女性学、家庭社会学、劳动社会学研究。

访谈时怀孕7个月。

长期以来,笔者一直关注留守儿童议题,特别关注留守女童的成长经验、情感模式和其成长后的婚恋状态。对3位女性留守经历的访谈让笔者感受到她们叙事中的情感和自主性,而叙事分析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①。由叙述研究关注女性个人经历、情感模式与时代变迁等议题。研究并不局限于讲述3位有留守经历的女性的故事,而是从她们的叙事中汇聚起和映射出性别、社会、时代和历史的结构与变迁,着力打破个体和结构的二元区分。

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讨论了有关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的情感模式的形成^②。3位讲述者带有泪水、不满、感恩和倔强的叙述,展示出了乡村以家庭为本的日常生活流变,以及女性情感模式在代际传承间的类型、性别角色的多元化和新生代女性创造新型互助型夫妻关系的主体性。1990年前后出生的新生代女性具有社会结构特征,她们成长于移动互联网时代,是国家教育兴国和乡村振兴等公共政策的受惠者。本文希望通过她们对自身经历的叙述分析作如下考察:第一,展现她们对留守童年的叙事,理解她们日常生活中对家的定义;第二,理解她们对留守经历与情感选择的叙事,分析两代女性间性别角色的变迁和实践;第三,将国家的职业教育政策、移民搬迁政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纳入对新生代女性角色变迁的理解中,发现结构变迁和主体性之间复杂的关系;第四,从理论上反思中国父权制文化和现代性的市场化变迁对新生代女性解放的新途径。

研究使用叙事方法,叙事不仅是情感表达,也是认识方式和理解方式,是阐释生活意义的方式^③。第一,当年的留守女童作为“边缘人”,她们的声音需要被听到,叙事就是倾听她们的声音,让其声音自然流露和呈现,而不是被呈现、被表述、被建构,由此展现她们眼中的留守童年,发现她们的生活世界,发现留守经历可能形成的情感模式。有研究发现,父亲外出对农村儿童成年后的工资收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母亲外出对农村儿童成年后的工资收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成年后工资收入较低的农村儿童,父母外出对女孩成年后工资收入的影响幅度要大于男孩成年后工资收入的影响幅度;但对于成年后工资收入较高的农村儿童,父母外出对女孩和男孩成年后工资收入的影响幅度差异较小^④。在这些数字背后,需要听到成年了的留守女童的声音。第二,通过叙事理解生命过程,理解在某种环境之中把自身生命创造出来的东西,即理解人与那个曾经把其创造出来的人之间的生命联系,即母女联结,由此寻找存在于生命之中的连贯性。在这里是寻找两代人关于女性角色认知的连贯性,以及其如何体验和实践有价值的生活、制定有关生活的种种规划、根据发展看待自己的过去和塑造自己的未来。第三,带入实践感和历史感,展示在实践的场域中个人的生平情景、性情倾向和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相互联系,如布迪厄所言:就是面对实践中的各种选择——反应——惯习进行分析^⑤。透过对个人叙事中情感与经验的理解,展示社会的历史过程与个人能动性的联系,如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与发展方式、教育普及、乡村振兴和移民搬迁政策是如何汇

①参见郭于华:《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彭维锋:《从苦难遭际到主体建构:当代农民工镜像的嬗变与成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②参见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③应星:《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④韩保庆,王胜金,张敬霞:《父母外出与子女发展——童年留守经历如何影响成年工资收入?》,《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4期。

⑤[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集到每个女性的个体命运中,成为女性实现新型生活方式探索的基石。最终,在理论讨论中带入历史感,从工业化进程的视角看父权制的演进与变迁。

二、留守叙述中“有奶奶的家”

在中国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历史变迁中,大量的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父母外出打工的效益具有矛盾性。一方面,父母外出使其子女缺少情感和照料上的支持,另一方面,父母外出打工改善了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增加了农民工子女接受中等及以上教育的机会。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状况明显好于农村非留守儿童^①。后一种状况不言自明。对打工家庭而言,“亲职”,即对一定是母亲在身边的强调需要讨论。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双职工家庭中由祖父母照顾孩子的比例非常高,那时没有一个词叫“留守儿童”,虽然那个时代城市双职工父母可能要下放劳动。市场化条件下,乡村中的父母外出打工,其子女被称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一词最早出现在1994年,特指农村儿童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儿童留在户籍地,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情况。段成荣等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对14周岁以下的留守儿童数量进行了推算,认为2005年全国留守儿童数量为2290.45万人。全国妇联课题组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18周岁以下留守儿童的数量进行推算,认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有6102.55万人,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②。在中国第一批留守儿童步入成年后,已有研究开始关注留守经历对留守儿童成年后的影响,有研究认为留守经历对育儿选择^③、受教育水平^④、成就等有影响,且负面影响较多。三个访谈对象皆是这个年龄阶段的留守女童。她们叙述中的共性是有个“奶奶”。

1996年出生的晓伟,说起留守经历最为心痛,她叙述自己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还有一个比自己大6岁的姐姐,爸爸出去做生意,后来定居省城。其亲生父母分别再婚,母亲再嫁又有了一个儿子,但后来母亲再次改嫁。她的叙述爱恨交织。她说:

“真是一言难尽,现在跟我妈妈那边已经不联系了,她直接已经不管我们了。我讲得都心分裂,我的天。平常回老家看我奶奶,工资会给我奶奶一点,给她交电话费。我妈妈就和我们断了,我和我爸爸其实没有什么感情,因为他常年在外奔波,就没有给我们太多的爱。但是我想到我爸还是会很伤心,就像我现在都会很伤心,我完全没有体会到父亲的爱。就算他在的话,他也不会特意说关心一下,他在身边待的时间并不长。现在工作了,我也不会去省城看爸爸,有时间我就回老家,我宁愿去农村待,我都不想去和他们几个一起(省城的父亲家),我完全没有体会过父爱。我妈就是比较绝情的一个女人,我们直接断联了,她和我姐也没联系。电话一年到头也不打过来问,之前小的时候,她还会打电话来,就问我怎样怎样,现在都没了。太绝情了。我知道她在省内,比较没责任心的一个人,先

^①参见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005年第1期;段成荣,赖妙华,秦敏:《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变动趋势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6期。

^②全国妇联课题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http://acwf.people.com.cn/n/2013/0510/c99013-21437965.html,2013.05.10。

^③刘凌,吴蕾:《“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育儿选择影响的研究》,《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3期。

^④韩保庆,王胜金,张敬霞:《童年时期父母外出对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南方人口》,2021年第4期。

把我和我姐丢掉了,然后再婚,她已经三婚了。她二婚又生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把那个男孩子抛弃了,然后又嫁了一个,现在是第三个。其实我心里面还是对他们比较有怨恨的。我父母文化水平不高,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村出来的,估摸着文化水平就是小学。

“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爷爷走得早,我奶奶已经91岁了,开始奶奶还带着我姐,没有其他叔伯兄弟的孩子,后来就带着我一个。其实我感觉我还好,因为我不像其他留守儿童,至少我还有我奶奶爱我。所以心智没有那些真正的留守儿童成熟。我比较贪玩,全靠我奶奶。有时候又在想,万一我奶奶走了怎么办?不行了,我忍不住要哭了。我好怕我奶奶走了,奶奶走了怎么办?(大哭)”

晓伟的叙述在哭声中结束,有对奶奶的担心和思念,在叙述中,她确认了父母因文化水平不高而忽视孩子的感受,但特别肯定奶奶的爱,奶奶就是“家”。工作之余,她说“回家”是回到有奶奶在的乡村。她认为是因为有奶奶才有了她贪玩的童年。为了保持和奶奶的联系,她给奶奶充话费。她重新定义了眼中的“家”——有奶奶的地方是“家”。虽然父亲在省城常常要她回去,但她却以自尊的方式保持着和父亲的距离。奶奶让她与这个世界有了联结,她最担心的就是奶奶走了怎么办,那是她全部的世界。

出生在贵州的大山里的阿霞,访谈时30岁,已婚,有两个孩子。她说:

“我的家庭比较特殊,我妈妈是改嫁的,我跟着我妈改嫁的,我知道我的亲生父亲,两家离得很近,亲生父亲是那种不着家的人,我长大后见过一次。我记得我5岁时妈妈带着我改嫁。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跟我妹相差11岁,跟我弟相差6岁。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出去打工,我妈妈没文化,不识字,只能做一些苦命活。她跟着我姑姑一起打工,我姑姑有文化。我妈因为不识字,她一个人回不了家,她不知道往哪里走,就只能一起出去,一起回来。那时寄钱都不会,教她寄钱给我们,给我们汇钱回来。现在父母还在外面打工,因为有微信语音了,我们经常通话,我觉得我妈妈很能干的。

“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爸爸也去找我妈打工去了,去了广州那边。我妈妈一出去的话,我们几个孩子都跟着奶奶,我就相当于是一个外人。虽然不是亲奶奶,但对我还说得过去,就是干活吃饭。跟奶奶在一起的那几年是最辛苦的,因为她年纪大了,干活干不了。当时我们有叔伯家一共6个小孩跟奶奶一起住,大人都出去打工了。大的干重活比较多,小的比如拿水,提一个小壶10斤的,我就是那种一扁担七八十斤。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挑水。现在让我挑,我感觉我都挑不动了,那时候又矮,又瘦,让我挑我可以挑,现在我挑不动了。那时候什么农活都干,挑水,挑大粪,家里各种农活都做。在山上,砍柴什么的是最普通的劳动了。那时我那么小,我那时候身高矮。因为我年龄比较大,我要照顾弟弟妹妹们。

“可能是我自己有小孩了,我理解我妈妈的不容易,为了小孩去上班。我们小时候肯定没有什么零食吃,那时候能够吃饱穿暖就不错了,像现在我们身为父母,小孩出去想吃、玩,我们肯定要尽量给,我想是一种心态。”

阿霞的叙事非常平淡,说母亲的改嫁是因为亲生父亲的“不着家”。对父母外出打工、对小时候干的苦活累活都是一笑而过。在阿霞的叙述中,留守的生活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生活,它没有晓伟所说的对父爱与母爱的期望,这样的心理感受可能与母亲外出打工汇钱回家有关,也可能与6个孩子和奶奶一起生活的经验相关,在一个“大家庭”中,他人眼中的苦难却是几个孩子和一个老人要活

下去的日常生活。作为6个孩子中最大的孩子,她有着一一种自信。

晓美,1996年出生在贵州农村,大学学历。访谈时她有一个妹妹在读高一,有一个弟弟在上初一。她说:

“我应该算是留守儿童的,我小学就没有父母陪伴过。他们去浙江打工了,在电子工厂里做工。那时是和奶奶一起住。2014年,我上初中一年级的的时候他们就回来了。他们就再没有出去过了。从小他们就出去打工,估计出去有七八年,连续出去七八年,我上初一时就回来了。我没有下过农田,但是会插秧,农田的活基本都可以干的。我们农村人能够考上大学全靠自己努力,补课什么的从来没有过,完全靠自己。”

晓美的叙事很平淡,对于自己能够考上大学一事,她没有归功于父母回来的照顾,而是强调靠自己的努力。

有研究用“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描述农村主要劳动力进城打工的乡村生活的社会情景。再生产劳动中的父母赡养、子嗣养育,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等安排交由他们在乡村地区的老家完成,这种再生产模式确保了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由此将全球范围内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过来,推动中国迅速转变为世界工厂^①。“老家”是个沉默的、承载着人的再生产任务的存在。三位有过留守经历的女性叙述告诉我们:人们想象中的“被赡养的父母”正是养育和庇护“子嗣”的重要力量和心理支持,奶奶们构成了孩子童年记忆的全部,重构了她们对家和亲情的定义:晓伟明确表示“家”就是乡下的奶奶家,虽然父亲在省城,但她不认为那是她的家。在被成人安排的世界中,“奶奶”成为家的永恒记忆,在阿霞的心中奶奶虽然年龄大了,并且不是血缘意义上的奶奶,但她依然是6个孩子的依靠和庇护,奶奶是家中的核心力量。在冷酷的市场理性下,在由无数打工者通过流下汗水所带来的GDP的增长中,是祖母们在背后为留守的孩子们提供了温暖和家的记忆,笔者有着同样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姥姥”构成的全部童年。人们的刻板印象共同塑造了“脆弱的老年妇女”形象,但老年妇女的韧性和贡献需要被看到,那就是老年女性利用自身资源与逆境互动过程中习得和发展的保护性个人特质^②。“有奶奶的家”对留守儿童来说是有着社会联结性的地方。

在大量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中,常常只用父亲外出和母亲外出作指标来衡量留守的状况,甚至可能不自觉地使用中产阶级“密集母职”的文化审视上千万母亲的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的心理伤害。事实上,从三个有留守经历的女性叙事看,留守背后有着代际支撑,而预设的“被赡养的老人”正是“家庭重要的情感支持力量”,乡村社会传统大家庭中的祖母们的替代母职需要被给予肯定。黑人女性主义者帕特里夏·柯林斯(Patricia Collins)指出,在贫困家庭中,女性从一开始就要和丈夫一样外出工作,孩子被迫从小和父母分离,交给扩展家庭的亲戚或者社区网络的“他者母亲”(other mothers)来抚养。这种以女性为中心的扩展家庭网络的母职反映了在种族和性别压迫的境遇下非洲文化价值与功能适应的叠加^③。“有奶奶的家”不仅是家庭再生产的生活资源,也是其文化资源。

需要注意的是,对留守儿童心理影响最大的因素可能不是留守本身,而是父母之间的情感状况和父母对孩子的关心程度。只要父母之间有爱、父母能够通过打工提供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加之

^①参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清华社会学评论》第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②杜鹏,李子洋:《打破共谋沉默:老年妇女的韧性、贡献与赋权》,《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③COLLINS PATRICIA Hill. *Black Women and Motherhood. Rethinking the Family: Some Feminist Puestions*. Bo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15-245.

“奶奶”联结起一代一代的生命,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是能够领会到社会联结和亲情的。

三、自主的情感决策:恋爱、婚姻和生育

在三位留守女性有关恋爱、婚姻和生育的叙事中皆彰显出鲜明的自主性特征;但其情感模式也映射在她们的亲密关系中。

有研究认为,婚姻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①。对第一代打工妹的研究发现,进城打工可能改变她们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轨迹,特别是她们的婚恋观和行为^②。打工妹的情感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稳定型,恋爱结婚对象是同乡,但往往要求对象至少不能比自己差;第二类是困扰型,她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间不知所措或异地婚嫁,但是因外来人身份往往遭受歧视和误解;第三类是边缘型,指漂泊在城市边缘的大龄未婚农村女性;第四类是越轨型,即非婚姻的性关系^③。三位出生于1990年后的新生代女性,她们的恋爱、婚姻和生育与第一代差别非常大,她们充满着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与决策的能力。

访谈时,晓伟正与谈了6年的男朋友闹分手。她说:

“我们谈恋爱6年了,从大学开始的。他是这个城市的人,是家庭经济条件很好的独生子。不能在一起的原因是会冷暴力,我受不了了。我不喜欢冷暴力,我可能就会发脾气。发脾气导致对方冷暴力,然后就更夸张了。有时候还好,主要是沟通上,他爱冷暴力。他追我的那个时候,脾气好得不得了,就是变了。其实女生一生气,你哄哄不就好了,干吗冷暴力,对不对?我讲的都心分裂。我觉得他人品好。对老人,对他们家爷爷奶奶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我感觉女生,特别是像我这种,感觉有点无依无靠的那种,真的感觉原生家庭带来好严重的问题,很没有安全感。其实他都知道,我不想为了别人而改变自己。”

晓伟带着对父母离异、自己被抛弃受到的伤害,有着高度的自尊感,在恋爱关系中十分敏感,她虽然非常渴望爱,但恐惧失去,她最终选择的是“不想改变自己”,不能忍受冷暴力而放弃恋爱关系。

有两个孩子的阿霞,带着微笑讲述了自己的恋爱、婚姻和生育历程: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当时差一点没有继续读书。本来初中毕业时没想读书,因为成绩不好嘛。我爸妈在佛山那边,我也想去。我一说不读书了,家里面的奶奶、姑姑就开始介绍对象,我一听到介绍对象就好烦。那时16岁,我一听到要结婚,好反感,我不想那么早结婚。那我还是读书吧,我是因为怕他们给我找对象,才读书的。这太反感了,我不想嫁到农村,也不想干农活。因为农村的小孩都是干农活,做地里面的活。如果我没读中专,农村就是那样,早早地就结婚了,我可不想像我妈那样,那么早就结婚有孩子。我说要读书,她们就不给我介绍对象了。”

“我和老公是同学,老家是一个县的。我们自己认识的,我们在珠海实习工厂认识的,他追得我。那时是穷,我就是那种穷不怕,就是不喜欢那种男的嘴巴爱乱说、花言巧语的那种,油腔滑调的,我不喜欢。他能干,能吃苦,可以给我安全感。当时没有想要家庭条件好的,那时候我姑姑给我介绍的,人家那个条件确实好,我姑说你嫁过去就是收房租的,是

①参见李树茁,姜全保:《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②风笑天:《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③谭深:《外出和回乡:农村流动女性的经历》,《农村·农业·农民》,2005年第10期。

单位上的,有工作,她们同事的儿子。我那时候心里想着条件那么好,干吗还要相亲,肯定是人有问题,我心里是这样想的(笑)。我姑说要是别人我还不说,我是看他家庭条件好,你嫁过去是享福的才给你介绍的。我当时就想是不是哪里有问题,所以我就没答应。我和我男朋友相当于实习结束就确认了男女关系,实习的那一年多没在一起,他分到的是东莞那边,我在珠海。实习结束后,他到珠海找我,我们就去工厂打工,都是做一线工人,工种不太一样。在珠海工作了将近5年,2010年实习一直到2015年,差不多4年多。后来大概有半年多时间就是玩了,我喜欢玩,就是到处看看。有一段时间,我们去了陕西那边,那时候男朋友在那边给人装机,我没干活,我就在那里玩,给他们煮一些饭。给他们煮饭,一个月给我1000多块钱。我待了半年,觉得住着环境比较差,实在待不了了,我又回珠海了。

“2015年,因为有小孩了,所以就回老家办婚礼了。如果不怀孕我还不想结婚呢,当时的想法是到二十七八岁再结婚的,没办法,23岁就结婚生孩子了。我老公家里的条件也比较差,没有要彩礼。当时才摆了十几桌,我们的亲戚也不多。1月份结婚,我5月份生的孩子,是在他老家生的。2016年,老大几个月的时候,我又去珠海打工了,我是背着孩子,孩子奶奶当时在浙江打工,从浙江到珠海,我们当时在珠海租房子,我和老公打工,我婆婆带孩子,我们每天回去的,我不要把孩子放在家。这样有1年时间,2017年,我又回了老家,因为发现怀了老二,婆婆四十五六岁,她要出去打工,我就自己回了老家。2018年生的老二。怀两个孩子都是意外,要是给我选,我觉得我不要那么早。等我生老二的时候,婆婆不在,我就叫老公回来了,是他帮我坐月子,他休了40天。照顾完我他又去珠江打工了。2020年回来了。现在是两人一起为家奋斗,我老公比较节省,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我们的感情是挺好的。”

阿霞的叙述透着自信,她明确表示自己害怕找有钱的男人。她不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自信地认定自己有能力改变命运,不要“妈妈的命运”。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她坚持要和孩子在一起。产后,她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和婆婆到了珠海。她一边工作,一边要付房租和给孩子买奶粉,但她坚持“不要把孩子放在家”。当生育老二时,她要求丈夫且丈夫也乐意完成对她月子的照顾,阿霞不仅独立能吃苦,还有大主意,家里事情全是她拿主意。

有着大学学历的晓美,我们见面时她怀着7个月的身孕,她没有任何孕期反应,照她的说法:

“我一次也没有吐过,可能是农村出来的,皮实。丈夫也是大学毕业生,一次偶然的机会自己认识的。我找对象主要是看人,是看性格,我觉得性格上合得上就好。他们家离这里开车40分钟的路程,他现在在政府帮忙,在考公(务员)。我们的计划是我生了孩子,孩子奶奶带。我不会选择做全职妈妈。我就算领50块钱的工资我都要上班,我觉得女生一定要独立一点。你在家里面带孩子的话,真的是跟社会脱节了,真的不太好。我不想伸手向别人要钱,就算我工资再低,我要养活自己。现在我们都是自己用自己的。分着用,他剩下的钱是会存,我就没有向他要。我们现在是租的房子,晚上回家,他做饭,他要锻炼做饭,以前他是不会的。我在准备公务员考试,每天6点起床学习,学习好了再上班,所以晚上就很累,9点要睡觉。考过一次公,成绩过了,但面试没过。我就想考,我要考到35岁考不上再说。我还年轻,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我想考在职的研究生。今明两年能考上公务员的话,我就会考虑在职研究生。因为心里面想去学一些新的东西。”

从晓美的叙述中看到是出生于农村的新生代女性将留守的印迹被叙述为“皮实”,而不是城

市女孩的娇气。

金一虹提出“流动的父权”概念,指出打工女性离开农村原生家庭的父权体制,婚后可能随着外出打工的丈夫进入流动的父权制^①。有研究认为,以女性为主体的外出务工经历可能会支撑女性创业型的向上流动,实现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质量的提升^②。杨善华的研究明确指出,劳动力市场显化了妇女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进而逐渐改变了家庭的权力结构形态^③。这需从性别结构与城乡、阶级等其他多重社会结构之间的交织互动,以及自身主体身份的认同和重构中考察女性身份的变化^④。刘凌和吴蕾新近的研究表明,留守的生命事件会显著提升其物质生活水平,但也使其与父母的亲子关系疏远,形成自立且自卑的人格,这使其在学业和身心成长上受阻。在育儿选择上,他们均倾向于采取高质量亲子陪伴,兼顾子女身心成长的流动抚育方式。

与刘凌等的研究相同的是,这三位女性的叙事展示了她们的独立和自我主张;但没有自卑,亦没有在学业上受阻,这是不是由于“奶奶”提供了完整的家之爱有关?这值得深入观察和讨论。或许还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有过留守经历的人遇到情感困境时很容易将其归因于留守经历;当与晓伟讨论她与男朋友存在的沟通问题时,她直接就转移到“那个女人(指母亲)抛弃我们……”(并情绪激动)在育儿上,阿霞的确努力陪伴在孩子身边,但没有采取流动的方式,而是在县城安家。综合三位的叙事,大体可以分辨出三类与亲情联结、与信任相关的私人情感模式。第一类是以愤怒为基础的自尊型情感类型,表现为对情感关系的敏感、缺少安全感和看重自我尊严。如晓伟,其愤怒的原因不在于留守,而是父母情感的破碎,自身在父母关系中失去位置带给她很深的心理伤害;当她面临自身的爱情时,更关注沟通和爱的提供,当出现问题时,她的不安全感就促使其反抗,坚持“我不会改变”。第二类是以艰苦生活为底色的自信且负责型情感类型。如阿霞,父母虽然不在身边,但知道父母外出打工是为了改变家庭生活的困苦,生活的艰苦似乎为父母外出打工的必要性提供了明确的证明,父母在一起的打工生活让其相信夫妻情感联结的“自然与必然”的属性,当她开始有情感生活时,强调要找能够同甘共苦的人,当外出打工时,也要承担起照顾孩子和家庭的责任。第三类是以需求被满足为基础的自爱且学习型情感类型,如晓美,她在初中时父母的回归,让其感受到无言的关爱和自身的重要性;在偶遇恋爱对象后,她勇敢地进入恋情,并规划和设计工作和家庭。这三位女性皆超越了传统女性角色中的依赖性,她们自主、自强和自立,是埃利亚斯所言的现代人,具有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的情感模式。

这一过程中男性亦在改变。有研究指出,男女平等关系不是从特权阶级,而是从那些来自农村的城市打工族开始变化的。在经济高压的环境之下,丈夫不得不主动参与家务劳动,作出了“男性妥协”。都市资本的残酷现实瓦解了父权制的特权,丈夫开始转变传统观念,开始与妻子同甘苦、共患难,打破了由环境造就的男性特权^⑤。虽然阿霞会抱怨丈夫什么都不会做,但丈夫的确感同身受地理解了母职的重担和劳作,家内营造了相互支持的夫妻关系;在性别革命的路上,男性家庭角色的变化或许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意外后果;女性则是主动创造新型性别关系的主导者。

①参见金一虹:《中国新农村性别结构变迁研究:流动的父权》,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袁超,张东:《流动赋权: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质量》,《经济经纬》,2021年第1期。

③杨善华,沈崇麟:《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2页。

④吴小英:《城乡迁移的性别化逻辑及其机制:一个交叉性分析的范例》,《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

⑤参见蔡玉萍,彭钢旒:《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四、新生代女性受惠于教育与新型城镇化的社会发展

在对“数字经济赋权县域女性”的调查过程中,最令人兴奋的是看到了中国乡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她们离开了乡土,开始在县城发展。三位女性的叙事中不仅有留守的经历还有接受中等教育的经历,她们的命运与欠发达地区教育与城镇发展的脚步相一致。

(一) 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欠发达地区女性提供了成长时间

2009年,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和涉农专业免学费工作的意见》,国家的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极大地鼓励了农村经济困难的青少年进入职业学校^①。对中职招生门槛较低、有些采用注册式招生入学有不少批评,认为西部经济欠发达民族地区部分的中职学校在办学活动中还存在许多问题^②。的确,对中职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的问题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政策使更多的贫困青少年能够享受到更高一级的学习机会^③。

事实上,进入职业学校,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女生来说不仅是学习机会,更多的是身心拥有了成熟的时间。如阿霞所说,“学习成绩不好,我不愿意继续上学。但不继续读书,就要嫁人生育,我不要像妈妈那样,那么早生孩子”。正是拒绝“妈妈命运”的初衷让她进入中等职业学校——门槛低、免学费。这让欠发达地区的女性们摆脱了早婚早育的历史命运,2~3年的职业学校生活给了她们身心成长的时间。

教育无疑为个体获得自致性向上流动提供了阶梯,这一因素对男性可能更好地转化为了人力资本,对女性更可能成为其推迟婚龄、摆脱早婚这一代际命运的重要的中介变量。就婚姻而言,中国人的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79岁,经过2000年的24.14岁,2010年的24.85岁,到2020年达到28.67岁,两性差异缩小。女性初婚年龄的持续上升明确地受到高等教育的影响。教育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且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④。杨菊华^⑤的研究进一步说明,教育时间的延长必然挤占或缩短个体生命事件的其他时间,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之间的相互关联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双重路径,求学的时间形成的校园禁闭、改变婚姻品味、降低婚姻收益都作用于初婚年龄,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越高。教育在时间上的替代效应对女性的作用可能更为明显,成熟女性在婚姻上更可能作出负责任的选择。

(二) 女性当家的新型城镇化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其第十七条指出:“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支持大中城市疏解产业向县域延伸,引导产业有序梯度转移。”新型城镇化意味着从“乡土中国”迈向了“城乡中国”。大规模的农民工将逐步回归家乡,在家乡城乡社会空间体系中重新扎下根来,这将重构一个以县城为中心的新社会空间和新社会形态^⑥。中国社会

①张冀:《“十二五”期间中国必须关注的三大人口问题》,《河北学刊》,2010年第1期。

②林宜玉,林士俊:《对民族地区初中生中职入学教育引导的探讨》,《教育与职业》,2013年第14期。

③参见王喜雪:《多元视角下中职学生资助政策评价研究》,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④王鹏,吴愈晓:《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6年的研究》,《社会》,2013年第3期。

⑤杨菊华:《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双路径的理论思考》,《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⑥焦长权:《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上半程与下半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正开创城乡融合的新时代^①。大城市中居住成本的不断攀升,使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很难居住到环境条件好的社区中,剥夺了其对城市的归属感^②。不少女性是无奈地回到县城,但几乎很少回到村子。笔者访谈的112位女性皆有外出打工经历。

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新型产业发展为县域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为其留住人才提供了动力。调查发现,数字经济引入县域,既能超越县乡本身自然条件的限制,为其提供第三产业就业岗位,助力发展现代新型就业,又能在城乡之间、代际之间建立联结,实现非拆分的家庭再生产模式。蚂蚁基金会支持的数字就业中心的项目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特点,为女性提供了在就业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平衡兼顾的路径。对县域从事数字就业的949份调查问卷显示,其中女性从业者占65%,从业女性中有10.1%的认同“以照顾家庭为主”是择业目的,有78.3%的认同“兼顾职业发展和照顾家庭”是择业初衷,只有11.6%的认为是“以自己职业发展为主”。新型城镇化对化解农村拆分型家庭再生产模式提供了解决方案,有更多的农村人到县城工作和居住,由此完成城镇化过程。

阿霞的婆家是在贵州大山里,她很幸运地赶上了婆家的扶贫搬迁工作。“十三五”时期,贵州省规划搬迁187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49.3万人,约占全国搬迁规模的1/7。截至2018年,贵州省已完成搬迁入住123万人,占“十三五”时期搬迁总规模的65.76%^③。为此,中央累计下达近800亿元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为妇女创造了全方位的宜居环境^④。2018年,阿霞一家从山区来到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的旺家社区,这个社区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自2018年以来,这里承接了搬迁群众4232户,18379人,“村里人变为城里人”。搬迁的住房政策是以家为单位,每人20平方米住房,阿霞的夫家兄弟未婚,算入其户口,她家分到80平方米(当时二孩还没有出生)的三居室。

蚂蚁基金会支持的“AI豆计划”目标是帮助女性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脱贫,阿霞所在社区的微信群里发布了招聘信息,她立马报了名,成为第一批学员,学习两个星期后,她顺利通过测评并上岗。她每天坐在电脑前,双眼盯着屏幕,点击鼠标选中一张路况图,把其中的行人、机动车、红绿灯等一一标注出来,工资按件计算。2022年8月调查时,她的7月份工资成为中心最高者,拿了一万元出头。她说:“这种项目能到我们西部来,首先是技术的进步,一根网线打破了传统的时空局限;其次是公益的力量,企业愿意将这种数字化产业的红利分享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现有1881个县市,农民到县城买房子、向县城集聚的现象很普遍^⑤。安居与乐业成为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重要的课题。在“家”与“业”同时发展的过程中,阿霞规划了她的家庭生活,2020年,她让丈夫回到了县城,丈夫也曾在数字就业中心从事标注工作,但这份工作要求的细致使其深感不适,后来他做了骑手,每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2022年,阿霞说通丈夫,首付10万元,买了一套期房。这一固定资产的获得使她工作更有动力,生活也多了一份满足和奋斗的目标。这一购房行为也打破了父权制下从夫居的习俗,是核心家庭自我筹划的生活方式。

对从事数字就业的人的949份问卷调查发现,有337位女性有自己名下的房产,占比35.5%。女性拥有房产的情形与其生育状况相关,在已育女性中,有近半数(49.2%)的人住房由男方家庭资助,超过四成的人由双方家庭共同资助。在县城安家成为新生代乡村女性向上流动的新途径。有

①参见李河:《中国乡村文明的百年变迁:从“乡土中国”到“城乡融合”》,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22年版。

②马健因,徐昊楠:《新生代女性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变化轨迹及影响因素——对厦门市外来女性的案例分析》,《管理观察》,2017年第11期。

③陈政,朱翠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贵州实践”》,《中国国情国力》,2019年第5期。

④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脱贫攻坚网络展》,http://www.cpad.gov.cn/,2020.05.12。

⑤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

研究认为,改革前男性比女性有较多的“农转非”机会,这种性别优势主要体现为男性具有较为优势的个人特征,如教育程度。但到了改革后期,男女的机会趋于平等^①。在县城买房多是以女性为明确的需求方,女性以生活方便、有利于孩子上学等理由,要求在县城买房。这种状况可能是由于随着生产性家庭向生活性家庭的转变,妇女当家愈益普遍^②。因为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妇女在处理家庭日常事务、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维系以及家庭对外的人情往来方面都更具有优势,这奠定了妇女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③。由此构成新型的城镇化生活模式。

五、理论讨论:工业化进程、家庭与妇女解放

回顾三位有过童年留守经历的女性叙述会发现,她们的命运是嵌入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历史中的,她们的主体性形成于父母为改变家庭生活困苦的努力中,留守的、有奶奶的童年历练了她们的生活能力和独立自强的的心智,她们成为自我生活的承担者和责任人。

在家庭构造的妇女生命价值实现的框架中^④,妇女地位的提升不一定以男性地位的降低为代价,而是建立了更加和谐、平等的夫妻关系,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自主权得以提升^⑤。中国社会教育水平和城镇化率的总体提升使更多的人成为这一社会变迁的受惠者,新生代女性以自身努力提升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她们创建出由女性主导的互助型夫妻关系。当然,这三位女性的叙事,只是乡村现代城镇化进程中的积极面相。调研发现,能否有中专以上学历成为女性从业的重要门槛,这既显示了教育改变命运的重要性,也说明教育具有社会分层机制。学历成为分水岭,那些没能进入中职以上教育的女性被排斥在诸多机会之外。

文章至此该结束了,但还有些多余的话,即笔者思考了百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女性命运与父权制的终结问题。在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女性多被视为廉价劳动力,她们是被组织、再结构和可控制的“劳动力”,依附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我们听到了另外的叙事,即女性开创了自身的生活。它始于父权制家庭中女性低微的命运将结束于互助型家庭中女性主导的位置。

第一代女性知识分子陈衡哲出生于1890年,面对女性“在家从父、嫁人从夫、夫死从子”的命运,为了读书,她立下“终生不嫁”的字据,远涉美国学习。她提出了“女性要为自己造命”的概念以回应女性的集体命运,她总结了中国女人的三种命运:第一种是安命,女人逆来顺受;第二种是怨命,女人抱怨生为女儿身;第三种是造命,即女性创造自己的命运^⑥。由此开创了中国女性的“造命”之旅。

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史看,女工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并成为资本最感兴趣的劳动力。

①边燕杰,李颖晖:《体制转型与户籍身份转化:“农转非”微观影响机制的时代变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②胡业方:《家庭及村庄核心功能变迁与妇女权力的建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③李霞:《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

④杨华:《隐藏的世界: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327页。

⑤参见徐安琪:《夫妻权力与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左际平:《从多元视角分析中国城市的夫妻不平等》,《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1期。

⑥陈衡哲:《陈衡哲早年自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这些资本既包括了殖民帝国主义的资本、官僚资本,也包括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资本^①。费孝通的小说《茧》,作为其《江村经济》的“文学版”,书写了20世纪30年代苏南乡村一家新兴制丝企业的种种境遇,生动地描述了纺织工厂进入小镇后的女工以及由此引发的紧张的婆媳关系和当地父权制文化复杂的变化^②。有研究认为,费孝通用宝珠这一女工形象,展现了他理想的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过程,即个体在家(茧)与工厂的意义重叠与张力中得以成长,随之确立的是基于现代个体而成立的新的生活世界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家既是个体的养育之所,也是个体的动力之源与安居之所^③。笔者认为,小说更多展示的是女性个体生成及其与父权制家庭的矛盾,女工身份直接挑战了父权制家庭制度本身。

田汝康1940年调查了昆明纺织工厂,访谈了600多名女工,这其中90%以上是没有结婚的年轻女性,已婚的只有46人,占7%(其中只有17人是与丈夫同居,其他要么丧偶,要么关系不和)。这些女工进入工厂,绝大部分是为了逃避家庭的痛苦,因“在家待不住”,通过亲戚介绍进厂的。这些家庭的痛苦包括:受到继母虐待、受嫂子的气、对所订婚姻的不满、与父母斗气、母亲改嫁……在传统社会,对艰难求生存的底层女性来说,工厂就是她们的福地;工厂是女工逃避家庭痛苦的暂时栖息地。研究还发现,女工家庭普遍因这些年轻女性离家入厂做工感到羞耻,认为女性在外工作抛头露面就有辱门风。一旦家庭危机解除,女工们即辞职返回家庭^④。在妻子和母亲具有管家责任的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格局下,女性进入工厂构成了对传统的挑战,这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巨大动力^⑤。可以看出,中国千年巨变中,女性进入工厂、为家庭挣得生活所需的事实打破了沉睡的男性为尊的父权制。

闻翔在《劳工神圣》中专门讨论“田汝康的女工研究”,指出女工在工业化过程中依然带着传统家庭的印迹处理工厂中的关系。一是女工很少谈及厂方的设备、工作的繁重以及工资的高下。她们唠叨不断的是,哪个管理员的脸色和情感上的不满足,如厂方太刻板,太没有感情,即女工往往倾向于把工厂当作家,期待在工作中得到感情上的安顿。二是女工对家庭温暖的渴望。她们创造出类家庭的纽带。如某个宿舍12个女工的“假亲属的组合”,她们把自己想象成同姓的一家人,这家的男性家长失踪,母亲改嫁,几个儿子大多入赘别家。这种状况体现了女工希望自由择偶,不受父兄支配的愿望,她们在拟家庭的关系中组织成生活的团体。三是经济独立自主。女工虽然对工厂工作感到疲累,但对工厂生活却十分享受,用工资买金戒指、新皮鞋、新旗袍,结伴去看电影^⑥。工厂的生活为女工确立了一条解放的路线。

工业化早期走进工厂的多是未婚女性,她们要“成为人妇”的历史命运依然是她们的“茧”。在传统社会中,女性保持独身不嫁是行不通的。当女性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养蚕、织锦等有了养活自己的能力时,再加上她们目睹了女人在婆家受气,地位低下,便开始掌握自我的命运,成为自梳女。自梳仪式具有婚嫁的隐喻,自梳使女性有了已婚女性的形象,又能满足其不想嫁人的愿望。晚年在“观音堂”“祖堂”“姑婆屋”“斋堂”等,自梳女以集体义务的形式,担当起亡故姊妹的丧葬之责。在自梳女的世界中有一种相扶相助的契约关系^⑦。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由女性参与工业化而

①参见佟新:《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参见费孝通:《茧》,孙静,王燕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③参见凌鹏,孟奇:《家、工厂与中国现代个体的诞生——对〈茧〉中人物生活世界的分析》,《社会》,2023年第1期。

④参见田汝康:《内地女工》,载史国衡:《昆厂劳工》附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⑤马雪峰等主编:《魁阁文献2:魁阁学者劳工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页。

⑥闻翔:《劳工神圣》,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61-165页。

⑦参见赵克生,谢光荣:《端州风物》,第十五章“静静的观音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产生的独立女性反抗父权制家庭的生活实践。

梧州火柴厂曾经是童工出身的一名女工谈起对自梳女的羡慕：

她们自己把头梳起来,不再嫁人。结婚找负担,要服侍家婆,三从四德,要带子女,又要做工。吃斋清静,集中住,吃的是辣椒、豆酱、腊肠、油浸咸鱼、蒸猪肉,她们吃得多惬意呀,你看见口水都流,自己吃自己的工资^①。

苏耀昌指出,士绅社会对这些女性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破坏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其目的在于调和男权专制与成功地进行蚕丝生产之间的矛盾。若是女工越过这个限度,拒绝工作,破坏生产,那么宗族就会毫不迟疑地使用族权来粉碎罢工反抗”^②。这意味着女性参与工业化进程所要求的解放直接产生了对家庭的反抗和冲击。

令人欣慰的是,留守的女孩子们在奶奶的照看下成长为独立自主的女性,她们的情感模式是自尊、自信和自强,她们不再像自梳女一样要打破父权制家庭制度本身,而是用情感改造夫妻关系,开创了一条由女性主导、丈夫参与照顾劳动的互助型夫妻关系之路。这也该是女性“造命”的伟大成就。

The Left-behind Experience, Emotional Patterns, and the Practice of Mutually Supportive Couples: Narrativ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Left-behind Experience

TONG X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listen to the narratives of three women who have been left behind girl and understand their affective model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ir shared childhood with their grandmothers has imprinted memories of “a home with grandmother”, where they learned independence and resilience. As they grew, they independently navigated their emotions, parenthood, and spousal relationships, shaping three distinct emotional patterns: one rooted in anger, leading to a sensitive and self-esteem-driven emotionality; another influenced by hard work and diligence, fostering a confident and self-reliant emotionality; and the third centered on fulfillment, cultivating a self-loving and learning-oriented emotionality. These new-generation women are beneficiari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in underserved regions of China. They seize opportunities, take control of their own destinies, become creators in breaking free from patriarchal and maternal fates, and emerge as leaders of mutually supportive spousal relationships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Key words: left-behind experience; grandma's home; emotional patterns; subjectivity; mutually supportive spousal relationships

(责任编辑 鲁玉玲)

^① 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6页。

^② 苏耀昌:《华南地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188页。